

# 权力人口问题探析

——从新加坡谈到苏州

穆光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结合新加坡和苏州的案例探讨了“权力人口问题”。权力人口是指手握大小权利的人们构成的社会阶层或集团。在社会阶层结构中, 权力人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影响着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效率。权力人口的素质和作为是追求卓越的基础。权力人口问题就是关键的少数人影响非关键的多数人的问题。在社会人口学的视野中, 权力人口问题值得予以高度的关注。

**关键词:** 权力人口; 人力开发;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0)04-0046-04

## Discussion on the Issues of Authoritative Population

——From Singapore to Suzhou

MU Guang-zo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authoritative population by taking Singapore and Suzhou's cases as the examples. "Authoritative population" refers to the social groups in power who plays the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life, impacting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the parity and efficiency of modern society.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authoritative population are the foundations for their achievements. The key issue of authoritative population is the minority impacting the majority. From social demographic point of view, authoritative population should be get attention to.

**Keywords:** the authoritativ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modernization

权力人口, 顾名思义, 是指手握大小权利的人们构成的社会阶层或集团。权力人口是一个亚人群, 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却举足轻重。权力人口的权威和作为决定着—个社会的秩序和效率。权力人口掌握着可以动员和配置其他资源的“资源”——权力, 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了时代的掌舵人、民众的领

路人和事业的决策者。由于权力人口往往关联着社会的命运, 所以加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不妨先聊聊新加坡, 也许从中能获得深刻的启迪。自从1959年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理以后, 新加坡经济以每年8.4%的速度增长。这样到了1996年, 新加坡已经从一个热带海港的城市

收稿日期: 2000-03-22

作者简介: 穆光宗(1964—), 男, 浙江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副教授, 人口与发展专业博士, 主要从事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和老龄问题研究。

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九大富国，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由该年元旦宣布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发达国家，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23万美元，超过英国和新西兰。但新加坡地少人少，并无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令人深思的是，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却可以与西方经济强国相抗衡。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睿智的李光耀开出的药方是：网罗最能干和最坚强的人来领导新加坡，积极开发人力资源，这是追求卓越的基础。亦即，新加坡采纳的是人本主义的发展战略。

1967年，李光耀在新加坡经济增长初见成效之后曾畅谈新加坡的生存之道，他认为继续前进须靠三个因素：第一，是否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第二，人民是否愿意从工作上获得他们之所需，而不是要不劳而获；第三，我们的人民是否具有进取的素质，是否具有推动力，是否有预先采取经过思考而有计划的冒险能力<sup>[1]</sup>。说穿了，也就是领导者的素质问题和老百姓的素质问题。李光耀对权力人口的重要性有极为深刻的洞见。他认为：“千千万万的命运往往决定于国家基本单位人口的素质、力量和眼光”，“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在稳健的进步中团结坚强起来，或者是在混乱中支离瓦解，衰败堕落，都全由他们来决定”。<sup>[2]</sup>李光耀举了二战期间的一个例子：当时处境困难、危机四伏的英国在丘吉尔首相和他周围的一小批人的英明领导下，使整个国家获得鼓舞和决心，与几乎不可克服的险恶环境奋斗。他们都是有才干和决心的人物，他们能够激励人民为国家前途群策群力，团结奋斗。新加坡又何尝不是在优秀的权力人口的领导下才开始迈向成功与繁荣的大道？李光耀也坦承，从新加坡早期到现在，基层领袖的特点就是具有坚定不移的素质，而基层领袖的素质和献身精神恰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sup>[3]</sup>。在新加坡权力人口构成的塔尖上，“呼风唤雨”的则是杰出的领袖人物李光耀。李光耀的智慧、坚强、爱心和干劲使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业皆成，造就出一个现代化的新加坡，成为光耀千秋的人物。

理想的权力人口应当是由具有什么样素质的人来组成的呢？大致可以认为，这是社会成员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分人，他们坚定智慧、敬业爱民、重诺笃行、开拓奉献、廉洁公正。但这样的人才总是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自上而下的选择需要慧眼，现代的做法也可以是公开招聘，像北京现在局级领导干部都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而不是通过行政系统委派

任命，这既体现了民主，也实现了公正，而且往往效果较好，真可谓“古有伯乐相千里马，今有市场识真才俊”了。

新加坡可谓是精英政治的成功实践。李光耀坚信人才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只有不断成长、改革、求变，才能使这个岛国屹立不倒。他深信劣币驱逐良币的道理，认定拙劣的领导人会杜绝好人才于门外。假如不以发掘人才为重，把有潜力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国家的发展必定会有麻烦。具有历史洞察力的李光耀1971年4月28日曾发表“国家成功的要素”的演讲，共列出5项，其中一项就与“权力人口”有关——李光耀所界定的“权力人口”指的是一批有干劲、愿意付出代价，而又受过良好教育，并且训练有素的人口。翌年，李光耀预言：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一股不可漠视的强大经济力量。1990年，李光耀资政再次预言：“中国将花30~40年才能达致韩、台的水平，70~80年才能达致今天日本的水平。”——亚洲发展银行对90年代的预测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日本和新兴工业国。1992年，李光耀谈到了中国的权力人口，言辞恳切：“妨碍中国前进的因素主要是缺少有专业知识的官员，执行政策和落实计划的官员和干部，他们必须接受全面的训练，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专家，而不仅仅是对党忠诚的干部。”<sup>[4]</sup>李资政指出了中国权力人口“含金量”的不足。

众所周知，苏州是中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一个好去处。那么苏州的权力人口素质如何呢？在苏州现代化的进程中，“权力人口”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从大的方面讲，苏州权力人口是比较优秀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涌现出了不少人物，突出如张家港市委书记秦振华，一个人的名字同一个城市的辉煌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1996年11月初，笔者等赴苏州调研时，苏州新区领导曾介绍三个习以为常，给人印象深刻，即顶点加班习以为常，带病坚持习以为常，顾全大局习以为常。在苏州经济建设过程中，离不开权力人口率先垂范的带动作用——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精于业务、廉洁奉公、开拓奉献的权力人口是苏州基本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但据说开发区也有在经济上出问题的例子。为此，新区狠抓廉政，采取了以丰养廉等办法。

秦振华，这个响亮的名字，现今已成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他不做升官发财的梦，想的是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所领导的城市和老百姓做

事。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点年纪还求个啥，就是朝前奔，只要老百姓好！”正是有他这样不是眼睛向上，而是眼睛向下的“官”，才会使昔日“苏南之苏北”的张家港走到全国百强县行列的第二位，拥有今天的辉煌。1995年5月13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张家港时，高度赞扬张家港和秦振华的实干精神。“张家港是干出来的！”各级领导是率领苏州人民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核心群体，他们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苏州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健全用人环境和用人机制，使正当年富力强、堪当重任的优秀人才能在领导岗位上大展宏图是一项关键的工作。看来，很有必要对苏州权力人口现状、素质及心志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未雨绸缪。搞一个专项调查是有必要的。

在权力人口的构成中，除了前述的决策者群体外，企业家群体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我们的想象中，苏南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是农民企业家繁星如天的地方。农民企业家的涌现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与苏州男耕女织的传统使草根工业率先发芽的小气候共同促进的产物。苏南乡镇企业从星星之火到形成燎原之势的过程。社会是大学，实践出真知。农村能人，农民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所开办的太平盛世中成了商品经济的“弄潮儿”，大批农民企业家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

法国史学家丹纳曾经指出：与大自然的气候相类比，人类社会也有一种“精神气候”（大意）。这种“气候”本身虽然不产生人才，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顽强地影响人才、造就人才。社会环境及文化传统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气候”。苏南的社会环境是安定祥和的，古来就有男耕女织的传统，勤俭是绝大多数人的美德，致富光荣是他们长久的理念和渴望，发达的文化又使不少地方、不少家庭书香四溢，那里的人民有着健全的理智和聪慧的头脑。这种素质和内在的冲力是后来农民企业家大批涌现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自古至今，苏州拥有的一长串闪耀的名字中，当不乏在商言商的英才。苏南地区农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相对来说就比别的地方要来得高，所以也就更容易培养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领头雁”。可以料想，随着时代的进步，企业家群体也会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一是人员的优胜劣汰，新一代素质更高的农民企业家终将成长起来，二是农民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千锤百炼中也将完成自身的改造，旧的不良的素质将有所消退，而优雅和强悍的东西将生长起来。

从而使他们在“基本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发挥出更积极持久的作用<sup>①</sup>。

在实际生活中，决策者群体和企业家群体能精诚合作，交互辉映成苏州的“星光灿烂”。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敢冒风险、敢于拼搏的胆魄又使他们创下了业迹。特别是，奋斗在经济建设第一线的他们能够得到乡镇干部的支持和理解，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任尔东西南北风，咬住中心不放松”，自然是民富国强。由于两种权力人口能取长补短，互相支持，所以苏州的农村面貌才一日新于一日，一日强于一日。正如有的论者所描述的：“有人才选择时，乡镇领导拓视野、辟财源、为农民企业家成长开辟通道；在项目决策时，乡镇领导又与他们一起拿主意、搞调研、下决心；在对外联系时，乡镇领导与他们一起走南闯北，融通关系，搭桥牵线；在生产管理过程中，乡镇领导又常常去现场办公，为他们排忧解难。更值得指出的是，乡镇领导为农民企业家提供了‘精神保护’。在实际工作中，博得‘满堂喝彩’的干部固然有，毕竟少数，而对于一些有争议干部怎么办？苏南的领导者坚持不听闲言碎语，不管说长道短，坚持实事求是，以实绩作为衡量干部的主要标准，看大节，看主流。正是由于乡镇领导的这种关心、爱护和支持，农民企业家才得以健康成长。”<sup>[5]</sup>这种能人标准而非完人标准的做法显然是切合实际的，为苏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人才成长的条件。

从道理上讲，权力人口既然是少数人可以影响多数人的特殊社会成员，那么从中国的文化来理解，这些成员最好是由“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分子来构成，他们应当是千人为俊、万人称杰的佼佼者。如何培育、选拔和重用，又是一个艰深的话题了，限于数据和材料，笔者这里只能是点到为止，提出问题供同好者参考。

从现今苏南农民企业家的素质来看，互有短长，良莠不齐。在市场化改革的大潮中，大多数农民企业家表现出了较好的敬业精神。以张家港为例，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可观业绩离不开一大批不怕挫

<sup>①</sup> “基本现代化”被看作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其内涵根据苏州市计委的总体构想大致可以概括为：综合经济实力有较大提高；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城市基础设施先进；经济外向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具备现代生活设施和现代生活方式；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公民素质明显提高这几方面的内容。具体内容见《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暨基本现代化总体规划的建议》。

折, 自加压力, 事事争优的农民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在创新方面, 苏南农民企业家也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 在新产品开发以及组织制度创新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毋庸讳言, 改革不过数年, 一些农民企业家还没有完成脱胎换骨的过程, 传统小农意识有时还会羁绊他们的手脚, 陈旧的知识架构也制约着他们的视野和作为, 如此等等。农民企业家自身的一些缺陷是在情理中的事, 但在时代的迎来送往中, 这一群体事实上也在完成结构上的双重更新: 知识结构的更新和人员结构的更新。随着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农民非农化进程必将加速, 新一代企业家群体必将形成和扩大, 这是苏州农村基本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应当注意保护和培养。

在市场经济的急风骤雨中, 权力人口也必然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不足为怪。眼下议论纷纷的“59岁现象”——一些即将退位让权的干部在“付出太多, 得到太少”、“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心态的驱使下陷入腐败的泥潭而晚节不保的现象; 还有“能人夭折现象”——一些企业家虽然经营有方, 但自律不严、贪心不足, 结果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而自毁前程的现象, 均说明了改革既是干部成长的机遇, 也是对干部人格和素质的挑战和检验。如苏南某县, 在乡镇企业初创时期, 曾树立了29块金牌, 即29位明星企业家, 目前有的已失去昔日光环甚至销声匿迹, 走上了法纪不容的道路, 真正风采犹存的仅有50%左右<sup>①</sup>。应当说, 有些能人的夭折是十分可惜的, 既自毁人生, 也是社会的一个损失, 这表明我们所处的大变革的时代的确是机遇和挑战并重, 政府部门从保护人才的角度出发, 最好能未雨绸缪地做些工作, 不断提高企业家的综合素质, 特别是在

德行操守方面, 努力减少“能人夭折”现象。若到无力回天的地步, 这不仅是个人之不幸, 又岂不是社会之不幸? 认真对待, 当为上策。

张家港在营造权力人口群体方面有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好经验。他们选用企业领导不唯学历、不唯资历, 只要有才干、工作有实绩都委以重任。针对现代企业家需要具备更高更新的科技知识, 早在1984年就建成了全国第一所县办大学——沙洲工业学院, 迄今已培养出数千名大专毕业生, 成为乡镇企业人才的摇篮; 与此同时, 在政策上则出台了《张家港市科技进步奖励办法》, 《关于资助科技人员出席国际科技人员会议的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鼓励性文件, 建立了人才档案, 对用非所长的及时调整岗位, 而把管理能力强的放到领导岗位, 目前全市企业领导中科技人才比重已占到80%, 从而切实提高了企业家群体的素质水平<sup>①</sup>。任何提高权力人口的“含金量”, 始终是实现基本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话题<sup>②</sup>。

#### 参考文献:

- [1]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 李光耀40年政论选. 新加坡: 现代出版社 1994. 127.
- [2]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 李光耀40年政论选. 新加坡: 现代出版社 1994. 138.
- [3]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 李光耀40年政论选. 新加坡: 现代出版社 1994. 237.
- [4]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 李光耀40年政论选. 新加坡: 现代出版社 1994. 608.
- [5] 汪长根. 苏南农民企业家崛起的宏观背景与环境因素. 苏州大学学报, 1994(2).
- [6] 叶南客. 苏南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与首选战略——苏南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三论. 学海, 1996(2).

<sup>①</sup> 参见张家港市委在全省两个文明建设现场交流会上总结材料“总揽全局, 抢抓机遇, 踏实苦干, 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1995年3月, 第15—16页。

<sup>②</sup> 创造“昆山经济奇迹”的昆山人认识到: 干部素质的高低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 但人才需要组织, 需要激励, 展志尽才都离不开“权力人口”的判断和安排。所以, 说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决策者群体和企业家群体), 班子正, 事业兴。这是屡试不爽的经验法则。参见张树成《成功之道——昆山市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 载吴声功主编《知与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